

# 清代以前中国古籍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以及史料价值

张应龙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州 510632)

**摘要:**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个问题: 1, 记录马来西亚历史的中国古籍的基本情况, 2, 从中国古籍看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认识, 3, 中国古籍对构建马来西亚历史的学术价值。指出, 中国古籍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 1, 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历史时间非常长; 2, 中国古籍记载的马来西亚古国数量非常多; 3, 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 4, 中国古籍的记载是研究马来西亚古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来源, 在马来西亚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古籍 马来西亚 史料价值

在研究东南亚古代历史之中, 中国古籍的记述历来是学者们十分重视的资料来源。同样, 研究马来西亚历史, 中国古籍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本文主要从史料的角度来评论中国古籍有关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载对构建马来西亚历史的学术研究价值, 而不是以中国史料为基础来全面论述古代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和变化。

从一般意义上, 中国古籍的时间范围应该包括整个清朝时期。但是, 由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马来西亚在 16 世纪后也变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因此,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古籍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在时间范围上限制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 即 1840 年以前, 1840 年以后的史料不在本文所论述的时间范围。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古籍的著作选择范围是以林远辉、张应龙编《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年版) 为基础。在叙述不同时代的古籍时, 是以该书的出版或者写作时间先后为依据, 因为我觉得后代人所写的前代历史, 虽然参考了以前的资料, 但也掺进了当时的认识或者资料, 将它们放在一起不利于考察某一时代人们的真实认识水平。

## 一 记录古代马来西亚历史的中国古籍基本情况

中国自古有着记述历史的传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堪称发达, 中国历代的历史学家都推崇和坚持客观记载历史的传统, 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比较严谨和客观可靠的。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类型包括官方的历代正史和宫廷实录, 百科全书式的类书, 民间的杂史, 游记和地理志等等。

就清朝前期(1644—1840 年)的中国古籍而言, 记述马来西亚历史的中国古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 (一) 正史

正史是指由官方组织编写的记载中国某一朝代的历史著作。中国很早就有由官方组成人员撰写历史的传统, 起初是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 如《汉书》[1]等, 到后来则由新王朝组织人员撰写前一王朝的历史, 从而保持某个王朝历史的完整性。编写官方王朝历史的作者一般学术水平较高, 而且具有收集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条件, 所写的著作通常比较严谨, 史料价值较高。从汉朝(公元前 206 年—220 年)到清朝(1644—1911 年)1000 多年历史中, 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220—589 年)部分王朝的正史如《三国志》, 《晋书》, 《魏书》, 《南齐书》, 《北齐书》, 《周书》之外, 历代正史都有关于马来西亚诸古国的记述。记载马来西亚古代历史的中国古籍有《汉书》、《宋书》[2]、《梁书》[3]、《陈书》[4]、《隋书》

[5]、《南史》[6]、《北史》[7]、《旧唐书》[8]、《新唐书》[9]、《宋史》[10]、《元史》[11]、《明史》[12]、《明实录》[13]、《清史稿》[14]、《清实录》[15]等等。

## （二）类书

类书是一种记载历史、政治、制度、经济贸易、交通、地理、气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著作。资料丰富，取材广泛，条理清楚。记载有关马来西亚古国情况的大型类书有《通典》[16]、《唐会要》[17]、《太平御览》[18]、《册府元龟》[19]、《玉海》[20]、《通志》[21]、《文献通考》[22]、《明会要》[23]、《明会典》[24]、《三才图会》[25]、《续通典》[26]、《清朝通典》[27]、《续文献通考》[28]、《清朝文献通考》[29]、《宋会要辑稿》[30]、《古今图书集成》[31]等等。

## （三）杂史

杂史是指官方编修的正史以外的历史著作。中国民间一向有编修历史著作的传统，编写者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民间文人，其著作的水平也参差不齐。通常来说，民间编写的历史著作不少史料价值较高，历来是历史研究者十分重视的资料来源。由于民间著作没有像官方著作那样受到政治因素的较大影响，而有的著作是作者利用本人的亲身经历加上参考有关史料写成的，所以，民间历史著作往往保留了许多官方历史著作所没有的资料。同时，民间著作的资料也常常是官方编写历史著作的资料来源，官方在编写历史著作时，必然要收集民间著作作为参考，尤其在记述外国的情况时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从民间著作抄袭过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马来西亚古国情况的杂史主要有《岭外代答》[32]、《诸蕃志》[33]、《云麓漫钞》[34]、《岛夷杂志》[35]、《皇明鸿猷录》[36]、《皇明象胥录》[37]、《咸宾录》[38]、《皇明世法录》[39]、《前闻记》[40]、《献征录》[41]、《罪惟录》[42]、《国权》[43]、《弇山堂别集》[44]、《菽园杂录》[45]、《五杂俎》[46]、《西园闻见录》[47]等。

## （四）地理志

中国一向对地理研究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官方将掌握各地地理情况看成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历代的各种书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著作，在记述地理情况时通常都与记述户口、民情、物产、交通等方面结合起来。在论述全国性的地理著作中，通常都包括了他们所知道的外国概况。所以，在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中，保留了不少关于外国情况的重要资料。记载马来西亚古国情况的地理志主要有《异域志》[48]、《大德南海志》[49]、《明一统志》[50]、《皇明四夷考》[51]、《皇輿考》[52]、《武备志》[53]、《郑和航海图》[54]、《殊域周咨录》[55]、《东西洋考》[56]、《环宇通志》[57]、《海语》[58]、《西洋朝贡典录》[59]、《顺风相送》[60]、《指南正法》[61]、《海国闻见录》[62]、《大清一统志》[63]、《皇清职贡图》[64]等。在这些著作中，《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无疑是十分详细的海上交通路线图。

## （五）游记

在中国古籍中有为数不多的游记，这些游记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而写下的著作，因此在中国古籍中其史料价值非常高。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古代记载马来西亚历史的游记主要有义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65]、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66]、马欢写的《瀛涯胜览》[67]、费信写的《星槎胜览》[68]、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69]、王大海写的《海岛逸志》[70]、谢清高口述的《海录》[71]等。除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只有很少的记载之外，其他著作的内容都非常丰富。

## （六）一般文集

在中国古代一些私人文集中，由于作者担任过某种官职或者因为有某种经历，所以他们撰写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这些文章或建议被收录到私人文集中去。涉及马来西亚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宋濂写的《渤泥国入贡记》[72]、胡广写的《渤泥国恭顺王墓碑》[73]、朱纨写的《海洋贼船出没事》[74]、吴桂芳写的《议阻澳夷进贡疏》[75]等。其中宋濂写的《渤泥国入贡记》和胡广写的《渤泥国恭顺王墓碑》是关于明代中国与渤泥关系的重要资料。

## 二 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认识

古代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取决于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广度和深度，也有赖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意识。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了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具体历史环境的制约，受到交通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随着中国交通技术水平的发展，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也不断加深和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和准确。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而言，《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是中国最早记述中国到印度海上航路的资料，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这条航路的资料，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这段资料记载中国使者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从中国南方出使印度的过程。尽管认定这段资料所记载的地名到底在现在什么确实位置学者们还存在争议，但中国到印度的航路无疑是经过马来西亚的，有的学者认为这段资料中的“皮宗”就是位于马来半岛的北部。但是，即使“皮宗”就是古代马来半岛的一个地方，《汉书·地理志》也都没有提供比一个地名更多的情况，这也是学者们比较难以确定具体地方的原因之一。“皮宗”这一名称也许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最初认识。

从汉代以后，中国的使节、佛教僧侣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比较多的往来中国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尤其到南北朝时期（420—589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对东南亚的了解也比以前更加清楚。三国时期（220—265年），吴国派康泰、朱应于公元227年出使中南半岛，他们将所经过的地方以及传闻的东南亚古国情况写成著作，可惜这些著作早已散失，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但他们的著作显然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元5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里，马来半岛和婆罗洲一些国家不断派遣使节出访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关系。马来西亚古国使节的到访，使中国人有了直接接触海外情况的机会，因此，在当时中国南方几个王朝如宋朝（420—479年）、梁朝（502—557年）、陈朝（557—589年）的正史中均有了关于马来西亚古国狼牙脩<sup>①</sup>、婆皇<sup>②</sup>、丹丹<sup>③</sup>、婆利<sup>④</sup>的记载，并记述了这些古国的方位、气候、风俗、物产、社会、政治、历史的简单情况。这是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古国的初步认识。

公元488年写成的《宋书》，是中国官方正史中首次记载马来西亚的婆皇、斤陀利<sup>⑤</sup>和婆利等古国的著作。其中，对婆皇国的记述较多，除了记载婆皇国自公元442年至公元466年先后7次派遣使节访问中国外，还提到中国皇帝授予婆皇国使节“将军”称号的事情。此外，也提到斤陀利国和婆利国信仰佛教的情况，但对这几个古国的其他情况则是空白的[76]。稍后的《梁书》首次提到狼牙脩、丹丹、顿逊<sup>⑥</sup>，并对几个古国的情况有了一些描述，特别提到丹丹和干陀利两个国家的佛法大盛，并称顿逊是当时东南亚一个海上贸易的中心之一，每天参加贸易的人数达1万多人（这可能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珍物宝货，无所不有”[77]。

<sup>①</sup> 大约位于现在吉打至泰国 Nakhon Srithamarat 一带。

<sup>②</sup> 一说位于现在彭亨一带。

<sup>③</sup> 位于吉兰丹一带。

<sup>④</sup> 位于现在婆罗州北部一带，包括沙撈越和沙巴。

<sup>⑤</sup> 一说位于吉打和霹雳的 Kintan。

<sup>⑥</sup> 一说位于马来半岛北部。

《梁书》对狼牙脩和婆利两个国家的记述比较详细，主要包括这两个国家的大致范围、民情风俗、物产以及宫廷事迹。据《梁书》第78卷所记载，狼牙脩的国土面积东西长度是大约30天的路程，南北是20天的路程，距广州24,000里。首都城墙用砖砌成，设有几道大门，建有楼阁。国王出门乘坐大象，有仪仗队随行。国王以及贵族穿着华丽，一般百姓则以布围身，女人佩戴装饰品。《梁书》还提到狼牙脩在此400多年前就已经立国，后来在王族中出现一个贤能的人，娶了天竺国的公主，在国王死后继位为王。这实际上是讲狼牙脩印度化的问题。515年，狼牙脩派遣使节阿撒多访问中国，其送达的国书有部分内容被《梁书》所摘录。另据《梁书》第78卷的记载，婆利在广州东南海上，距离不详，大约需要航行2个月的时间。婆利的国界东西长约50天的路程，南北宽约20天的路程。有136个部落，稻谷一年收割两次。婆利国王的不同之处是头戴一个高高的金冠，佩戴镶有珍宝的金剑，出巡时乘坐大象拉的车，上有冠盖。522年在位的国王名叫频伽。婆利国在517年和522年派使节访问中国。《梁书》对狼牙脩和婆利的记述在中国古籍中是最详细的了，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其他中国古籍有关这两个国家基本情况的记述仍然没有超过《梁书》的记载。

大概可以这样说，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对马来西亚几个古国的印象是这些国家距离中国十分遥远，气候炎热，土产丰富，国土面积广阔，流行佛教或印度教（婆罗门教），国王穿戴华丽，具有较高工艺制作水平，先后派遣使节访问中国等，但对这些国家的具体地理方位还是不清楚，描述的对象主要是国王和王族。

到了隋代（581—618年），随着中国的统一，中国对外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公元607年，隋朝皇帝杨广派遣常俊、王君政出访当时东南亚的大国——赤土国<sup>①</sup>，这是历史上中国首次派遣使节访问马来西亚。毫无疑问，这次访问使到中国对马来西亚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写于7世纪初的《隋书》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隋书》对婆利的记述比以前的著作多了婆利国王的姓名、官职、兵器、祭祀的内容。

《隋书》对赤土的记载无疑在中国古籍中是非常详细和精彩的。据《隋书》第82卷的记述，607年隋朝皇帝杨广派遣常俊、王君政出访赤土，他们从广东出发后经过大约20多天的航行到达狼牙须。在赤土国的港口受到赤土国王派来的婆罗门僧侣所率领30多艘船的迎接，之后，再经过1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赤土的国都。《隋书》对中国使节在赤土国所受到的款待以及赤土国王宫的情况予以非常详细的描述。《隋书》还介绍赤土的面积、王室情况、官职、城市、民俗、宗教、气候、物产以及赤土的邻国、到中国的地理距离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赤土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并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大国。《隋书》关于赤土国的记述，几乎成为后来中国古籍关于赤土国情况的样本，后来的其他著作基本上是摘录《隋书》所记述的情况。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对外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写于801年的《通典》首次提到另一个古国哥罗国<sup>②</sup>，并称从汉代时中国就知道这个国家。《通典》介绍了哥罗国王的姓名、王宝、城市、车队兵器、税收、物产、民俗等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哥罗国属下有24个州，打仗时一个战斗单位（一队）配有大象100头，每头大象配有士兵100人。《通典》还首次详细介绍丹丹国国王姓名、官制、法制、人口、物产等方面的情况，指出丹丹的人口有2万多家，设有州县加以管理。关于哥罗和丹丹的情况以《通典》的记述最为详细。《通典》还首次提及边斗国<sup>③</sup>、都昆国<sup>④</sup>、拘利国<sup>⑤</sup>、比嵩国<sup>⑥</sup>，并指出这些国家在

<sup>①</sup> 一说位于吉打至泰国 Songkhla、Pattani 一带，或吉兰丹至彭亨一带。

<sup>②</sup> 位于现在吉打。

<sup>③</sup> 一说在吉兰丹，或者柔佛及新加坡一带。

<sup>④</sup> 在马来半岛。

<sup>⑤</sup> 在马来半岛西岸。

<sup>⑥</sup> 即皮宗，在马来半岛。

隋代时中国人就知道了。此外，也首次提到多摩长国和羊支跋<sup>①</sup>这两个地方[78]。

唐代也是中国佛教大盛的时代，不少僧侣纷纷到印度取经，唐代高僧义净就是其中之一。义净在赴印度学法取经时经过马来亚，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到羯荼国<sup>②</sup>，他本人就在羯荼国居住过。而在此期间，另有一些僧侣经过郎迦戍（即狼牙修）国，根据义净的记述，其中有义辉、智岸、法振等僧人死于郎迦戍，可惜义净没有留下更多的有关马来西亚古国的资料[79]。

唐代中国对外贸易发达，造船与航海技术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方面的发展反映在古籍中是关于海上航行的记载更加清楚。写于1060年的《新唐书》所引用的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资料，表明商船从广州出发后沿着海岸线西行到越南，然后南下马来亚。从广州到马来半岛南端的航行时间大约20天左右。《新唐书》还新提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一个叫罗越<sup>③</sup>的国家[80]。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581—907年）中国人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认识显然比南北朝时期有进一步提高和扩大，这表现在所记述的国家和地方数目有了增加，记述的内容如王室情况、刑罚、民俗、物产等方面更加细致和具体，尤其关于赤土、哥罗的记述是前代所没有的，而对于婆利、丹丹、顿逊等国的描述比以前丰富得多。

进入宋代（960—1279年）和元代（1279—1368年）时期，随着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政治、贸易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扩大，尤其是中国与位于东马地区的浞泥国关系非常密切。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记述内容更加全面，更加正确。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一部是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赵汝适曾经担任过福建负责海外贸易事务的长官，叫市舶提举。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以及本身负有向皇帝报告的责任，经常向从海外回来的商人以及各国到中国访问的使者和商人了解海外的各种情况。他所写的《诸蕃志》也就是各国概况。《诸蕃志》首次提到蓬丰（彭亨）、登牙依（丁加奴）、凌牙斯加（即狼牙脩）、吉兰丹、日罗亭<sup>④</sup>、单马令<sup>⑤</sup>等国名，并称这些国家是三佛齐的属国。《诸蕃志》对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sup>⑥</sup>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诸蕃志》对浞泥国的记载最为详细，包括中国到浞泥的距离，浞泥的社会、经济、风物人情、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人优待政策等，同时也记述了浞泥周围海岛的情况[81]。写于同时代的《文献通考》增加了关于977年浞泥派遣使节访问中国的经过，称浞泥的使节是一个叫蒲卢歇的阿拉伯人带来的[82]。由此可见，浞泥在很长的时间里与中国官方已经没有往来了。赵汝适对于浞泥、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等所作的记述，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成为后来中国其他古籍记述这些国家情况的基础。

汪大渊是元代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青年时代曾经两次到海外游历，到过马来半岛、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沿岸。他用8年的时间于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一书，涉及国家和地区220多个，其中有关马来西亚的有无枝拔<sup>⑦</sup>、丹马令、彭坑（彭亨）、吉兰丹、丁家卢（丁加奴）、苏洛隔<sup>⑧</sup>、浞泥、都督岸<sup>⑨</sup>、班卒<sup>⑩</sup>、龙牙菩提<sup>⑪</sup>、龙牙门<sup>⑫</sup>、东西竺<sup>⑬</sup>、万年港<sup>⑭</sup>等10多个古国和地区，所记载的古国和地区

<sup>①</sup>多摩长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羊支跋在马六甲以及附近的五屿。

<sup>②</sup>一般认为在吉打至玻璃市一带。

<sup>③</sup>在柔佛一带。

<sup>④</sup>约在马来半岛北部。

<sup>⑤</sup>一说在 Tembeling 一带。

<sup>⑥</sup>一说在 Kuala Dungun 或者 Beranang 一带。

<sup>⑦</sup>位于现在马六甲。

<sup>⑧</sup>位于现在吉打。

<sup>⑨</sup>位于现在沙捞越 Datu。

<sup>⑩</sup>一说在柔佛。

远远超过以前的著作。在《岛夷志略》一书中，首次提到的地名有无枝拔、苏洛隔、都督岸、龙牙菩提、龙牙门、东西竺、万年港等。汪大渊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注意记载这些国家的物产和贸易，中国与这些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所以《岛夷志略》是这一时期关于马来西亚古国历史十分宝贵的资料。汪大渊的记述，成为后来其他著作的主要资料来源。

此外，元代写成的《宋史》也首次提到丹眉流<sup>⑤</sup>，称丹眉流在 1001 年派遣使节访问中国[83]。另据《元史》的记载，1320 年元朝派遣使节出访龙牙门，1325 年龙牙门使节回访元朝，1286 年丁呵儿（丁加奴）和急兰亦鲋（吉兰丹）派使节到达中国[84]。

进入明代（1368—1644 年），郑和七下西洋这个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不但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的关系，而且大大拓展和加深了中国人对海外的了解和认识。首先，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各种关系。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中，马欢、费信、巩珍分别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对以满刺加王国和浣泥国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历史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论述。其次，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与马来西亚古国的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满刺加王国和浣泥国经常组成使团到中国访问，而中国也多次派了使节到马来西亚访问。因此在明朝宫廷档案《明实录》中保留大量关于明代中国与马来西亚古国交往的历史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历史档案。以后，在明代中国其他古籍中，都比较多地介绍马来西亚古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代中国有关马来西亚历史的著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以前历史时期。在明代后期民间著作中，以张燮的《东西洋考》最为杰出，它系统地记载了马来西亚古国的历史、社会、经济贸易、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内容。第三，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明代留下了中国人的海上交通线记录，在《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这三本著作中以及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对中国到马来西亚的海上航路作了详尽和清楚地记载，史料价值非常高。中国人对海外国家的交通方向和距离的认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含糊和笼统了。

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交往受到极大的破坏，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上 17 世纪末以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文献上记载马来西亚情况的著作变得少了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才重新得到发展。到 19 世纪末，随着中国派遣官员到国外访问考察，以及派遣驻外外交使节增多，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载便大量增多，而且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与以前的记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用比较生动细致的描述来论述有关问题。而在 19 世纪末以前，中国文献对马来西亚的记述，其风格基本一样。换句话说，中国对马来西亚或者对外国的记述手法，在清代末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有关清代末期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记述，需要另外论述，这里暂时省略。

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主要有《海国闻见录》和《海录》。《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虽然自己没有到过东南亚，但他长期在福建和台湾工作，对海外情况相当熟悉，所写的著作价值较高。在《海国闻见录》中，作者准确地记述了马来半岛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清楚地记述了这些古国的交通距离。从该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船是沿着中南半岛南下后，先到了加奴、吉兰丹、彭亨、柔佛，然后再到马六甲。该书还指出这些国家的民族是马来族，而不是像以前的历史著作那样只是笼统地称为“番人”（外国人）。谢清高口述的《海录》是清代另一本重要著作。由于谢清高本人到过马来西亚，所以他的著作就一直是学者高度重视的著作。《海录》对咭囉丹、丁加奴、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加坡）、马六甲、沙喇我（雪兰莪）、新埠（檳榔嶼）、吉德（吉打）、柔佛、文莱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海录》的记述，

---

① 即现在 Langkawi。。

② 一说指新加坡。

③ 位于柔佛。

④ 一说位于文莱。

⑤ 一说位于马来半岛北部。

是研究明末清初马来西亚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从中国古籍的记载反映出来的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认识，可以看出由于有关记载比较简略，不像记载本国历史那么详细和严谨，所以古代中国人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认识也不那么全面和准确。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大多数没有到过马来西亚，缺乏亲身体验，因此对收集来的资料判断起来有些困难，何况这些资料转来转去，免不了存在错误，因而在最后写成著作时出现一些荒诞的说法。同时，由于专业水平的限制，对马来西亚古国的地理形势的描述也不够精细，这给后来人的研究增加很多困难。当然，中国古籍对其他国家的记载也是如此。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籍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述有些简略，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古籍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载是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不是信口开河乱写一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史有记述马来西亚古国新情况时，往往是因为当时有马来西亚的古国派遣使节访问了中国，使到撰写外国情况的作者得到第一手资料（尽管这些资料不够全面深入），而中国古籍对马来西亚古国比较详细记述部分，往往是因为中国派遣使节出访马来西亚古国后得到比较多的资料而写成的，所以显得详细和生动。至于民间的著作，最精彩的著作是一些亲自到过海外的人所写下的著作。凡是在某一时代没有马来西亚古国到访或者中国没有派使节出访时，或者没有中国人到过马来西亚后写下著作流传于世，中国古籍中所作的记述基本上采取抄袭以前著作的做法，一般情况下是做一点文字上修改而已，但也不是作者自己发挥想象随意描述。因此，中国古籍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述是比较可靠的。从不同时代中国古籍的详细或者简单的记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两国交往的亲疏程度或者马来西亚古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大小程度。

### 三 中国史料对构建马来西亚历史的价值

清代以前，中国古籍中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记述包含了古代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以及海上交通路线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马来西亚古代社会的历史、社会、贸易、风俗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籍的记载，对认识马来西亚古代历史，对构建马来西亚的历史概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保留许多马来西亚古国王朝历史的资料，有助于认识和构建马来西亚的历史体系

在中国古籍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到马来西亚不同的古国或者地方的名字。在汉代时期只提到一个叫皮宗的地方。在南北朝时期，提到的马来西亚古国主要有婆皇、斤陀利、婆利、狼牙脩、顿逊、丹丹等国。在隋唐时期，新提到古国（地方）主要有赤土国、哥罗国、羯荼国、边斗国、都昆国、拘利国、比嵩国、罗越国。在宋元时期，新提到的古国（地方）主要有蓬丰、登牙依、凌牙斯加、吉兰丹、丁呵儿、佛罗安、日罗亭、单马令、丹眉流、无枝拔、苏洛隔、龙牙菩提、龙牙门、东西竺、淳泥、都督岸、万年港等地方。明清时期新提到的古国（地方）主要有文莱、彭亨、满刺加、丁机宜、婆罗、咭嚨丹、柔佛、吉德、沙喇我、旧柔佛、新埠等等。从不同时期提到的国名或者地名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一种历史的延续和发展。

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时，通常都是以现在的国界为基础。虽然世界各国的现在情况与其历史上的情况基本都不一样，或者历史上的国家版图比现在小，或者比现在大，但都离不开是以现在的疆域为讨论的基础。研究历史还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现在的国家在历史时间顺序上存在不同的王朝，而且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里同时存在不一定互相统属的王朝。中国的历史是这样，马来西亚的历史也是这样。

从中国古籍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中国所记载的马来西亚古国位置大致上以中国明代为分水岭。在明代以前，中国古籍所记述的马来西亚古国位置，在马来半岛地区的主要分布在半岛北部以及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明代以后随着满刺加王朝的崛起，以马六甲地区为中心的满刺加王朝以及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使成为中国古籍记载的重点。但是，

在东马地区，中国古籍所记述的古国则基本上没有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明代以前的中国人主要沿东海岸而下，然后到印尼，再往其他地区，对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地区接触不多或者不是那么清楚。二是对马来半岛西海岸虽然有了接触，但由于记载的地理位置不够清楚，其他人不大好掌握，很难在资料中反映出来。至于东马地区的古国，尽管有关婆利和浞泥的确切范围存在一些争议，但它们的范围包括了东马地区这种认识一般上分歧并不是很大。当然，由于中国古籍的记述没有附带精确的方位地图，导致我们在进行研究时面临不少困难。尽管如此，除了考古发现以及其他文献来源之外，中国古籍无疑是研究马来西亚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依据中国古籍的记载，马来西亚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即《汉书》提到的皮宗。同时，根据《通典》的记载，中国人在汉代时就知道一个叫哥罗的国家，哥罗国大约位于现在的吉打一带。位于马来半岛北部的狼牙脞，根据《梁书》的记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至于婆利、丹丹等古国，也至少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便已存在了。因此，就中国古籍的文字记载而言，马来西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了。

从汉代起，中国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载就延续不断，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古国的继承关系或者分化情况，但中国古籍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载，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多。在中国古籍中，对马来西亚各个古国的记载篇幅不一样，这可能与这些古国的强盛程度及对外影响力有比较大的关系。东马地区的古国起初是婆利，宋代以后是渤泥，明代以后是文莱，这三个古国基本上一脉相承的。西马地区的古代强国起初是狼牙脞，斤陀利，隋代是赤土，明代是满刺加，这几个古国是否存在互相继承的关系还有待研究，位于马来半岛中北部的狼牙脞和赤土国是不是后来分裂成若干个较小的国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一般意义上，马来西亚这些古代强国代表了不同时期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水平，而且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模式。

除了几个强国之外，在马来西亚还存在不少影响力稍为小一些的古国或者部落，它们的地理分布基本包括了现在马来西亚的各个州。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籍有关其他小国或者地方的记载，有助于研究马来西亚各个州的发展历史。

虽然中国古籍的记载缺乏有关马来西亚各个古国的创建时间或者灭亡的时间，我们无法建立一个准确、清楚和完整的马来西亚古代王朝史年表，无法准确地描绘这些古国的地理范围，但是，中国古籍以文字记载的形式，保留了许多关于马来西亚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对构建马来西亚历史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学术努力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的。

(二) 保留马来西亚古代社会生活资料，有助于了解和分析古代马来西亚的社会生活史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面貌会发生许多变化。由于古代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缺乏像现在这样的技术手段如录像、照相等，现在的人们只能从文字的记载中来重组古代人的社会生活图象。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马来西亚古国的社会生活情况包括了民俗、经济、宗教、物产等方面，虽然有关记载不够详细，但在相关文字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也是比较珍贵的了。

在民俗方面。古代马来西亚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通常是国王或者王族的生活要比平民的生活奢华，主要表现在居屋、衣服和日常生活方面。中国古籍在这一方面通常都会予以简单的描述，指出国王和大臣穿华丽的衣服，而一般百姓则是用布围身。王族的房子用木版修建，而百姓的房子用草叶搭成。至于民风，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马来西亚古国基本是民风朴素，而且似乎形成一种传统。不同时代的中国古籍在描述马来西亚古国时，用得最多的词汇是民俗淳朴，并记载这些古国对犯法者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如唐代的《通典》称无枝拔（马六甲）“通国守义”，人民性格直爽，如有失信者，罚金2两。丹丹国规定所有盗贼都要处以死刑[85]。中国古籍对婚俗丧葬方面也作了不少记述。显然，马来西亚不同古国的婚俗也不同，如赤土国的习俗是儿子成婚后便分家，只有最小的儿子与父母一起居住[86]。哥



罗国婚俗是以槟榔为聘礼，多者 200 多盘，或以黄金为财，多者 200 两，出嫁后妇女随夫姓[87]。渤泥举行婚礼的仪式首先是敬酒，其次是敬槟榔，然后是敬指环，最后是敬吉贝布或者金银[88]。无枝拔人注重婚姻，往往指腹成亲。丹马令在订婚时用锻锦和白锡。彭亨谈成婚姻时，一般要互换白银 5 钱[89]。至于丧葬形式一般都采用水葬或者天葬的形式。

在经济活动方面。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保留着与外国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而且古代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活动呈现出多点贸易的特点。例如，在南北朝时期，顿逊就是一个海上贸易的中心之一。到了唐代，罗越国“商贸往来所凑集”，每年都有商船到广州贸易[90]。宋元时期，有关马来西亚古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的地方明显增加。宋代的《诸蕃志》记述了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渤泥等贸易据点，其中对渤泥的贸易制度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据赵汝适的叙述，渤泥的民俗重视商人，哪怕商人犯下死罪，也只是罚而不杀。渤泥的国王亲自掌管对外贸易事务，没有他的许可，贸易活动不得开始[91]。另据汪大渊的描述，渤泥在管理贸易方面已是具有较高的水准。渤泥国选派一人专门负责出纳收税，没有纤毫之差[92]。在中国古籍所记载的贸易商品清单中，可以看出当时马来西亚从国外购进的商品种类是很丰富的，例如绢、酒、米、盐、糖、瓷器、漆器、铁条、金银等等，而且不同的地方对商品种类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除了商品之外，在贸易中还使用中国的货币。

在宗教方面，在明代以前的中国古籍中，所记述的马来西亚各个古国所流行的宗教是印度教（婆罗门教）和佛教。例如《梁书》记述了狼牙脩信仰婆罗门教的过程。《隋书》记载了赤土“尤重婆罗门”和印度教在赤土国的显赫地位。在顿逊，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就多达 1000 多人[93]。中国古籍在记述马来西亚信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同时，也记述了印度教和佛教对当地其他社会生活的渗透。在明代以及明代以后的中国古籍中，除了记载满刺加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之外，也记述其他古国信仰佛教的情况。这些记述对研究马来西亚的宗教发展史显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物产方面。在南北朝时期（420—589 年）中国就知道干陀利出产上等的槟榔[94]。隋朝时赤土国有甘蔗制成的酒，有牛、羊、猪[95]。古代马来西亚除了出产各种香料土产以及沿海地区产盐之外，还有马来西亚最出名的锡。汪大渊记述产锡的地方有无枝拔、丹马令、彭亨、龙牙门，其中称单马令产上等白锡[96]。明代马欢记述满刺加的产锡之处有两个，由国王亲自管理，铸成的锡块重 1 斤 8 两或者 1 斤 4 两，每 10 块用藤捆绑为 1 捆，40 块为 1 大捆。马欢还记述满刺加的土产有甘蔗、芭蕉、菠萝蜜、菜、葱、姜、蒜、冬瓜、西瓜、牛、羊、鸡、鸭等[97]。

中国古籍所记述的关于马来西亚古国的社会生活资料，对了解和分析研究古代马来西亚的社会生活历史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保留了许多古代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的资料，有助于研究马来西亚在亚洲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古籍中，保留了许多有关中国与马来西亚古国交往关系的资料，保留了一些马来西亚古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资料。如果我们不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解读这些资料，而是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解读这些资料，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中研究古代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史，研究马来西亚在东南亚或者亚洲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中国与马来西亚古国关系而言，从南北朝时期马来西亚古国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往来关系，现在见于文献记载的交往，最早是在公元 442 年婆皇国、455 年干陀利国、473 年婆利国派遣使节访问中国[98]。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马来西亚的古国都有派遣使节访问中国的活动。中国派遣使节访问马来西亚古国的活动，最早是隋朝派常骏、王君政出访赤土国，元朝派马扎蛮、杨庭璧出访龙牙门。明朝时期首先是派遣张敬之访问浚泥，然后是派尹庆访问满刺加，后来是派郑和、王景弘等人访问满刺加和浚泥，此后，明朝还多次派人护

送来访的满刺加和浣泥的使团回国，有的中国使节还因此葬身大海[99]。从整个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古国访问中国的次数要比中国出访马来西亚古国多的多。这种状态主要是因为古代中国是亚洲的文明大国，也是亚洲的经济发展中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外国具有较强吸引力。古代中国的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的中心，存在自大的心理。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马来西亚古国毕竟与中国的距离较远，因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到遥远的马来西亚。但是，从中国古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马来西亚古国一直是保持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明代达到最高峰的阶段。

中国与马来西亚各个古国双方不但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中国还几次运用大国的影响力，帮助马来西亚古国摆脱其他国家的控制，走上发展的道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与满刺加的关系。据中国古籍的记载，满刺加原来是暹罗的属国，每年要向暹罗缴纳贡金 40 两。1403 年明朝派遣尹庆访问满刺加，两国建立关系。1405 年满刺加派遣使节访问中国，明朝皇帝“册封”拜里迷苏刺为满刺加国王，自此之后，满刺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100]。在满刺加王朝时期，满刺加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友好。满刺加的前三位国王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而郑和 7 次下西洋都到达满刺加，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将满刺加当作最重要的中转站，在满刺加设立商馆——“官厂”，存放商品、货物、粮食、金钱。郑和船队到其他地方时，先在满刺加的“官厂”装载商品和粮食然后才出发[101]。郑和船队将满刺加当作海上贸易活动的据点，对促进满刺加成为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心之一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这一时期满刺加历史的记载，中国古籍中的材料是相当多的，如《明实录》、《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等。这些中国古籍的记载，对研究满刺加这个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放出灿烂光辉的王国历史无疑是宝贵的史料来源。

虽然中国古籍的记述重点在于与中国有关系的问题上，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来西亚古国的，但是，假如我们对中国古籍的记载所表露出来的某种自大的口吻不必太过于认真的话，马来西亚古国与中国建立的关系以及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是马来西亚古国参与亚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制。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指出，“在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即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102]。滨下武志教授的观点无疑富有启发性，如果我们去掉所谓的“天朝”与“藩国”的色彩，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朝贡”活动的话，在中国古籍中大量有关马来西亚古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资料，对我们研究马来西亚古国在亚洲或者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富有价值的。

中国古籍在记述马来西亚古国与中国关系时，也记述马来西亚古国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如《隋书》提到赤土国王有三个妻子是邻国的公主[103]。宋代的《诸蕃志》提到蓬丰（彭亨）、登牙侏（丁加奴）、凌牙斯加、吉兰丹、佛罗安、日罗亭、单马今都是三佛齐的属国[104]。宋代的《岭外代答》甚至提到佛罗安的国王由三佛齐选派[105]。此外，还有浣泥与印尼、苏禄、彭亨、满刺加与暹罗的关系等。所有这些资料，有利于我们全面研究马来西亚古国的对外关系。

如果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扩大的话，位于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的马来西亚在古代亚洲或者世界的贸易活动中也起了重要的活动。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古籍有关海上贸易的路线——即“针路”的记载，除了它所表达的路线的意义之外，它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来西亚古国在亚洲海上贸易网络中的作用。因为只有有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航线的建立，两地之间才有可能进行贸易等方面的往来，交通航线越多，贸易网络就更加丰富。中国已故向达教授指出，16—18 世纪中国记载的“针路”大致上分为六个区域，即（1）柬埔寨、赤

坎(越南的 Ke Ga)、暹罗区。其航线有柬埔寨至彭亨、柔佛、暹罗、大泥(Pattani);从赤坎至柬埔寨、彭亨、旧港(Palembang)、顺塔(Banten);从暹罗至大泥、彭亨、麻六甲、马军(菲律宾的 Manukan)。(2)马来半岛区。其航线有从苧盘(Tioman)至丁机宜(今 Kuantan)、旧港、顺塔、文莱;从麻六甲至阿齐(印尼苏门答腊的 Lhokseumawe)、暹罗、旧港;从大泥至池汶(Timor);从阿齐到万丹(Bantem)、别罗里(锡兰的 Galle)、傍伽喇(Bengal)、古里(印度的 Calicut)等。(3)古里区。从古里到忽鲁漠斯(Hormoz)、阿丹(Aden)、祖法儿(Dhufar)。(4)爪哇区。从爪哇到灵山(越南中部的 Thach Bi)、麻六甲;从万丹到池汶、马辰(Bandjarmasin);从顺塔到迟闷(Timor)、淡目(印尼的 Demak);从旧港到杜板(印尼的 Tuban);从咬留吧(Jakarta)到长崎。(5)吕宋(Luzon)区。从吕宋到文莱;从双口(Manila)到恶党(菲律宾 Panay Island 的 Oton)、宿务(Cebu)、网中礁老(今菲律宾的 Mindanao)、文莱、柬埔寨、长崎。(6)日本区。从长崎到广南(今越南中部)、双口;从暹罗到日本、长崎;从咬留吧到长崎;从大泥到长崎[106]。这 6 个区域其实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交叉的,他们构成亚洲的海上交通和商业网络,而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籍的记载对构建马来西亚历史全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积极意义。中国古籍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1,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历史时间非常长;2,中国古籍记载的马来西亚古国数量非常多;3,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4,中国古籍的记载是研究马来西亚古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来源。当然,中国古籍的记述由于技术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所记述的国家有些模糊,尤其是所记述的国名或者地名,由于没有精确的地图可供参考。使到后人在判断确切地点时困难重重,因而也存在不少争议,例如古代的地名到底等于现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认定确切地点对进行研究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也是通过中国古籍研究古代东南亚国家历史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在中国古籍中,有些记述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人们可以通过中国古籍记所述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加上其他材料进行综合的判断。总之,要全面研究马来西亚历史,需要从不同史料来源来加以互相印证,需要利用文字材料以外如利用考古发掘的材料来互相印证。在马来西亚古代历史或者东南亚古代历史中,中国古籍相对其他文字材料而言,具有记述时间比较早、比较有延续性和比较详细可靠的特点。中国古籍的记载,是我们研究马来西亚古代历史的基本材料,正是有了这些记载,马来西亚古代历史面貌变得更加清楚和有系统性。著名历史学家霍尔(D. G. E. Hall)教授说,中国古籍“对于阐明我们这个地区(指东南亚)的政治地理和贸易的确是无价之宝”[107]。可以说,中国古籍在研究马来西亚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 释:

- 1 《汉书》，汉代班固著，全书共 120 卷，其中有关古代马来西亚的记述是该书的《地理志》。
- 2 《宋书》，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全书共 100 卷，该书的《本纪》和《列传》均有马来西亚古国婆皇国、斤陀利国、婆利国的记载，这也是正史之中首次记载马来西亚古国的情况。
- 3 《梁书》，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书共 56 卷，该书的《本纪》和《列传》记有丹丹国、干陀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顿逊国的情况。
- 4 《陈书》，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书共 36 卷，该书《本纪》记有丹丹国、干陀利国、狼牙脩国的情况。
- 5 《隋书》，唐代魏征等编著，全书共 85 卷，该书《本纪》和《南蛮传》有赤土、婆利、丹丹等国的记载。
- 6 《南史》，唐代李延寿著，全书共 80 卷，该书《本纪》和《夷传》记有婆皇国、丹丹国、干陀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顿逊国的情况。
- 7 《北史》，唐代李延寿著，全书共 100 卷，该书《隋本纪》有赤土国的简要记载。

- 8 《旧唐书》，五代刘恂等编著，全书共 200 卷，该书《地理志》和《南蛮传》有赤土国、婆利国、丹丹国、狼牙脩国的简要记载。
- 9 《新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编著，全书共 225 卷，该书《地理志》和《南蛮传》有罗越国、哥罗国、哥谷罗国、赤土国、婆利国、单单国的简要记载。
- 10 《宋史》，元代脱脱等编著，全书共 496 卷，该书《本纪》、《礼》、《食货志》、《外国传》有渤泥国、丹眉流国的记载。
- 11 《元史》，明代宋濂等编著，全书共 210 卷，该书《本纪》和《外国传》有龙牙门、丁呵儿、急兰亦赳的简要记载。
- 12 《明史》，清代张廷玉等编著，全书共 323 卷，该书《本纪》、《食货》、《外国》有淳泥、彭亨、满刺加、婆罗、急兰丹、文莱、柔佛、丁机宜的记载。
- 13 《明实录》，是记载明朝历代皇帝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始宫廷档案，有大量关于淳泥国和满刺加王朝的记述，其中尤以满刺加王朝的记述最多，时间从 1370 年至 1550 年之间。
- 14 《清史稿》，清代赵尔巽主编，共 529 卷。
- 15 《清实录》，共 4406 卷，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载比《明实录》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占领马来西亚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受到极大的破坏。但从少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对马来西亚古国采取相当友好的政策，例如在 1742 年，清朝禁止荷兰统治下的印尼来中国贸易，但对暹罗和柔佛则采取继续开放的政策。
- 16 《通典》，唐代杜佑著，全书共 200 卷，记述的马来西亚古国有哥罗国、顿逊国、干陁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赤土国、罗刹国、丹丹、边斗国、都昆国、拘利国、比嵩国等。
- 17 《唐会要》，五代王溥著，全书共 100 卷，其中有关外国历史的部分，其史料价值在《新唐书》、《旧唐书》之上。记述有婆利国、盘盘国。
- 18 《太平御览》，宋代李昉著，全书共 1000 卷，该书关于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载来自历代正史。记述有赤土、干陁利、狼牙脩、婆利、婆皇、顿逊、丹丹、边斗、都昆、拘利、比嵩、多摩长等。
- 19 《册府元龟》，宋代王钦若等人编著，全书共 1000 卷，该书有关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述也是来自各种资料。所记述的古国有丹丹、赤土、哥罗、干陁利、婆利、顿逊、狼牙脩、婆皇等。
- 20 《玉海》，宋代王应麟著，全书共 200 卷，对马来西亚古国的记述相当简略。
- 21 《通志》，宋代郑樵著，全书共 200 卷，记述的古国有干陀利、狼牙脩、丹丹、婆利、赤土等。
- 22 《文献通考》，宋代马端临著，全书共 348 卷，记述的古国有干陀利、狼牙脩、婆利、赤土、勃泥等。
- 23 《明会要》，明代龙文彬著，记述有婆罗、淳泥、彭亨、满刺加等。
- 24 《明会典》，明代申时行著，全书共 228 卷，基本上是使用明朝官方资料，记述有彭亨、淳泥、满刺加、婆罗等国朝贡情况。
- 25 《三才图会》，明代王圻著，全书共 106 卷，该书的特点是将散见在各种书籍中的图谱汇编在一起，图文并茂，方便读者的直观了解，但其中的内容谬误不少。记述有满刺加、淳泥、龙牙门、佛罗安、婆罗、顿逊、登眉流等。
- 26 《续通典》，清代官修，共 150 卷，记述彭亨、丹眉流、满刺加、丁机宜、柔佛、淳泥、单单等。
- 27 《清朝通典》，清代官修，共 100 卷，记述柔佛、单旦、彭亨、文莱等。
- 28 《续文献通考》，明代王圻著，共 254 卷，记述满刺加、彭亨、柔佛、丁机宜等。
- 29 《清朝文献通考》，清代嵇璜等编，共 300 卷，记述柔佛、丁机宜、单旦、彭亨等。
- 30 《宋会要辑稿》，清代徐松编，共 366 卷，记述淳泥、丹眉流等。
- 31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分为 6 个汇编。这本大型著作的特点是将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原本照录，使读者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在第二汇编中有关马来西亚古国的资料有满刺加、斤陁利、狼牙脩、婆利、顿逊、婆罗、淳泥、丹眉流、彭亨、佛罗安、单马令等。
- 32 《岭外代答》，宋代周去非著，共 2 卷，记述的古国有佛罗安。
- 33 《诸蕃志》，宋代赵汝适著，共 2 卷，记述的古国有凌牙门、蓬丰、登加依、凌牙斯加、吉兰丹、佛罗

- 安、日罗亭、单马令、渤泥等。
- 34 《云麓漫钞》，宋代赵彦卫著，全书共 15 卷，记述的古国有渤泥、佛罗安、朋丰等。
- 35 《岛夷杂志》，元代陈元靓著，记述有凌牙苏加、佛罗安等。
- 36 《皇明鸿猷录》，明代高岱著，记述有淳泥、彭亨、满刺加、急兰丹等。
- 37 《皇明象胥录》，明代茅瑞徵著，共 8 卷，记述有满刺加、柔佛、淳泥、彭亨、婆罗等。
- 38 《咸宾录》，明代罗日褰著，共 8 卷，记述满刺加、婆黎、赤土、彭亨、渤泥等。
- 39 《皇明世法录》，明代陈仁锡著。全书共 92 卷，记述淳泥、满刺加、彭亨等。
- 40 《前闻记》，明代祝允明著，共 1 卷，记述郑和下西洋时的航行时间和经过地方。
- 41 《献征录》，明代焦竑著，记述满刺加、淳泥、彭亨等。
- 42 《罪惟录》，明代查继佐著，全书共 102 卷，记述有淳泥、满刺加、婆罗、彭亨、急兰丹等。
- 43 《国榷》，明代谈迁著，全书共 100 卷，记述有渤泥、彭亨、满刺加、婆罗等。
- 44 《弇山堂别集》，明代王世贞著，全书共 100 卷，记述满刺加、淳泥等。
- 45 《菽园杂录》，明代陆容著，全书共 15 卷，记述郑和下西洋经过满刺加、淳泥的情况。
- 46 《五杂俎》，明代谢肇淛著，全书共 16 卷，有满刺加、彭亨、班卒的简略记载。
- 47 《西园闻见录》，明代张萱著，对渤泥有详细的记述。
- 48 《异域志》，元代周致中著，全书 2 卷，提到马来西亚古国的有顿逊、单马令、佛罗安、赤土、渤泥、湓亨等。
- 49 《大德南海志》，元代陈大震辑录，该书第七卷记载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名，如日罗亭、凌牙苏加、吉兰丹、丁迦芦、朋亨等。
- 50 《明一统志》，明代李贤编，共 90 卷，最后两卷记载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关于马来西亚的有满刺加、淳泥。
- 51 《皇明四夷考》，明代郑晓著，共 2 卷，记述有满刺加、淳泥、彭亨等。
- 52 《皇輿考》，明代张天复编，共 10 卷，该书第十卷记述有满刺加、淳泥、彭亨、波罗、急兰丹等。
- 53 《武备志》，明代茅元仪著，全书共 240 卷，内分五大类，第五类是有关天文、地理、气候、海防、航海和外国国情方面的资料。记述有淳泥、满刺加、彭亨、婆罗等的情况。
- 54 《郑和航海图》，原载《武备志》第 240 卷，该书比较详细记载中国到马来西亚等地的海上交通路线以及行走的方向和时间等。
- 55 《殊域周咨录》，明代严从简著。记述渤泥、满刺加等。
- 56 《东西洋考》，明代张燮著，共 12 卷，是明代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记述赤土、渤泥、吉兰丹、麻六甲、彭亨、柔佛、文莱等的历史、地理、物产、贸易以及海上交通的航线。
- 57 《环宇通志》，明代陈循著，记述有满刺加、淳泥、彭亨、婆罗等。
- 58 《海语》，明代黄衷著，共 3 卷，1536 年写成。记述有满刺加等。
- 59 《西洋朝贡典录》，明代黄省曾著，共 3 卷，是综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两书材料而成，不是作者亲身经历，书中错误不少。对满刺加、淳泥、彭亨的记述较多。
- 60 《顺风相送》，记述中国到东南亚等地的气象、航线以及经过的地名等。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 61 《指南正法》，同上。
- 62 《海国闻见录》，清代陈伦炯著，共 2 卷，记述柔佛、彭亨、麻喇甲、文莱、丁葛奴等情况。
- 63 《大清一统志》，清代官修著作，全书共 560 卷，记述有婆罗、淳泥等。
- 64 《皇清职贡图》，清代傅恒等编，共 9 卷，记述文莱、柔佛、麻六甲等。
- 65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代义净撰，共 2 卷，该书记述的古国有郎迦戍国、羯荼国。
- 66 《岛夷志略》，元代汪大渊著，共 2 卷，记述无枝拔、丹马令、佛来安、彭坑、吉兰丹、丁家卢、苏洛隔、龙牙门、淳泥、单马锡、都督岸、龙牙菩提、班卒、龙牙门，东西竺、万年港等。
- 67 《瀛涯胜览》，明代马欢著，该书记载了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等方

面的情况，对满刺加国有比较多的记述。

68《星槎胜览》，明代费信著，共2卷，该书前集记载本人亲历海外各国的情况，后集收集传闻史实。记述的情况比《瀛涯胜览》还多，对满刺加、九洲山、东西竺、龙牙门、龙牙菩提、彭坑、渤泥有较多的记述。

69《西洋番国志》，明代巩珍著，对满刺加有较多的记述，情况类似《瀛涯胜览》。

70《海岛逸志》，清代王大海著，共6卷，对麻六甲、柔佛、吉礁等有简要的记述。

71《海录》，清代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记述有咭嚨丹、丁咖囉、邦项、旧柔佛、沙喇我、新埠、吉德、柔佛、文莱等。

72《渤泥国入贡记》，见《宋学士文集》，明代宋濂著。

73《渤泥国恭顺王墓碑》，见《皇明文衡》。

74《海洋贼船出没事》，见明代徐孚远等编《皇明经世文编》。

75《议阻澳夷进贡疏》，见《明经世文编》。

76《宋书》第97卷，“婆皇国”。

77《梁书》第54卷，“扶南”。

78《通典》第188卷。“哥罗”、“丹丹”、“边斗”、“多摩长”。

7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卷“义辉论师传”、下卷“义朗律师传”、“法振禅师传”。

80《新唐书》第43卷，“地理七”。

81《诸蕃志》上卷，“渤泥国”。

82《文献通考》第332卷，“渤泥”。

83《宋史》第6卷，“真宗本纪一”。

84《元史》第27卷“英宗本纪一”，第210卷“马八儿等国”。

85《通典》第188卷，“丹丹”。

86《隋书》第82卷，“赤土国传”。

87《通典》第188卷，“哥罗”。

88《诸蕃志》上卷，“渤泥国”。

89《岛夷志略》，“无枝拔”、“丹马令”、“彭坑”。

90《新唐书》第222卷，“罗越国”。

91《诸蕃志》上卷，“渤泥国”。

92《岛夷志略》，“淳泥”。

93《太平御览》第788卷，“顿逊国”。

94《梁书》第78卷，“干陀利”。

95《隋书》第82卷，“赤土国传”。

96《岛夷志略》，“丹马令”。

97《瀛涯胜览》“满刺加国”。

98《宋书》第5、7、9卷，“本纪”五、六、九。

99《皇明象胥录》第5卷，“满刺加”。

100《明史》第325卷，“满刺加国传”。

101《瀛涯胜览》“满刺加国”。

102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0页。

103《隋书》第82卷，“赤土国传”。

104《诸蕃志》上卷，“三佛齐国”。

105《岭外代答》第2卷，“三佛齐”。

106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0页。

107 D. G. E. Hall,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Third Edition, 1968, p.15.

参考文献:

- [1]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 [2]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 [3]朱杰勤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5]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6]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7]林远辉编:《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 [8]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9]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外关系史年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1]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1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3]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4]D.G.E.Hall,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Co.Ltd., Third Edition, 1968.

## the Pre-Qing Dynasty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on Malaysia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Zhang Yinglong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thesis discussed the Pre-Qing Dynasty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on Malaysia in three parts including the situation, ancient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Malaysia; historical value

收稿日期: 2005-6-10

作者简介: 张应龙, 男,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教授。